

DOI: 10.14015/j.cnki.1004-8049.2017.3.003

吴琳 “不对称合作中的政治风险与关系维持——以新世纪以来的中斯关系为例”,《太平洋学报》2017 年第 3 期,第 26-34 页。

WU Lin, “Political Risk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symmetric Cooperation: Sino-Sri Lanka Relations in the New Century”, *Pacific Journal*, Vol.25, No.3, 2017, pp.26-34.

不对称合作中的政治风险与关系维持

——以新世纪以来的中斯关系为例

吴 琳¹

(1.外交学院,北京 100037)

摘要: 现实中国际关系的合作常常是不对称性合作。随着国内—国际互动的加深,不对称合作关系的维持变得更加困难。一个重要现象或趋势是: 转型国家的政治转向未减反增, 导致大国与之发展不对称合作时不得不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如何认知威胁并维持不对称关系的稳定是决策者和学术界共同面对的难题。为解答该问题, 本文在梳理现有理论解释的基础上, 引入策略互动视角, 提出: 以危机援助、相互战略保证、第三方非正式协调等作为主要手段的策略互动是政治风险弱化、不对称关系维持的关键, 并以新世纪以来的中斯关系为例验证其适用性。该结论对于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探索与周边小国互动新思路具有重要启示。

关键词: 不对称合作; 政治风险; 策略互动; 中斯关系

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8049(2017) 03-0026-09

现实中国际关系的合作常常是不对称性合作。^①相对于大国间的对称性合作, 实力对比呈现巨大差异的大国与中小国间的不对称合作似乎更为普遍。在传统不对称关系中, 大国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 中小国家常常处于被动、附和或搭便车的状态, 可发挥的空间相对较小。随着国际关系中国内—国际互动的加深, 多元、跨国风险削弱了国家权力, 大国比以往任何时候

都更脆弱了。特别是相当一部分中小国家仍处于民主转型期, 各种形式和强度的政治转向未减反增, 政治风险与跨国安全威胁相互交织, 导致大国面对的合作形势更加严峻。^②一个突出案例是 2015 年初中国与斯里兰卡的多个大型合作项目在斯政府的单方面行动下被迫中断, 中国在斯利益面临威胁, 两国关系遭受严重冲击。^③

收稿日期: 2016-04-25; 修订日期: 2017-01-15。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东盟研究院“教育部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资助项目(CWZD20140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吴琳(1983—), 女, 湖北武汉人, 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法学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 东亚区域合作、中印关系、国际移民。

① 孙杰 “不对称合作: 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 《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 年第 9 期, 第 124 页。

② 引起不对称合作关系动荡的因素有很多, 笔者聚焦转型国家内部的政治转向给合作带来的不确定性, 同时也不排除第三方因素的作用, 但笔者认为, 第三方因素通常扮演的是间接性角色, 并不是决定性因素。

③ 唐鹏琪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的政治与经济风险——以中国在斯里兰卡的投资为例”, 《南亚研究季刊》2015 年第 2 期, 第 102-106 页; 卢光盛 “斯里兰卡国家风险评估与对策”, 《国际工程与劳务》2015 年第 11 期, 第 42-46 页。

那么,大国与小国应如何作为,以因应转型国家的政治风险,维持不对称合作稳定呢?为找到合理解释,本文首先梳理学界对不对称合作稳定性的讨论与不足,然后在此基础上引入策略互动视角,提出以危机援助、相互战略保证、第三方非正式协调等作为主要形式的策略互动是弱化政治风险、维持不对称合作稳定的关键。最后,以新世纪以来的中斯关系为例,验证该结论的适用性,并总结其政策启示。

一、不对称合作的稳定性: 现有解释与不足

关于不对称合作的稳定性问题,当前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给出了以下一些解释。

1.1 霸权稳定论

霸权稳定论的基本论断是,单一权力中心会带来体系的稳定。特别是如果霸主有意愿为体系提供安全、经济秩序等方面的公共产品,则更有助于体系的稳定。^①当然,在此体系之下形成的不对称关系也相对稳定。根据霸权稳定论的分析,霸权主导下不对称合作的稳定性主要依赖于稳定而悬殊的实力对比,途径是霸主自愿为体系提供公共产品,以维护其在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体系中的其他国家则通过搭便车等机会主义策略获益。^②这就导致一方面不对称关系中实力分布的严重不均衡态势,会使弱国在与强国的冲突和合作中难以占优的预期受到强化,打消弱国挑战霸主权威和主导关系进程的动机;另一方面,霸主在不对称合作中处于绝对的主导地位,导致双方在不断相互依存关系的进程中,出现脆弱性和敏感性的巨大差异,弱国采取不合作态度和举动的成本太高,因此更愿意留在不对称关系中,遵守既定的运行规则,并维护体系的稳定。

霸权稳定论对于实力对比和公共产品的论述与中国同斯里兰卡的不对称合作具有一定的相关性,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中国在体系层面提出惠及多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并有意愿为包

括斯里兰卡在内的实力弱小的体系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政策等公共产品,从而推动不对称合作进程的行为。然而,在控制情境变量方面,霸权稳定论的解释力就出现了问题,主要表现为:霸权稳定论主要是以结构和体系作为切入点,忽略了过程和互动中的影响因素,而这些恰恰是维持中斯不对称关系稳定的重要因素,比如斯里兰卡民主政治发展的独特性,斯里兰卡与印度历史上延续至今的特殊关系,中国与印度在南亚、印度洋地区的战略竞争等等。

1.2 联盟管理与持续理论

国际关系学者广泛运用联盟理论分析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不仅涉及联盟的形成与调整,而且也涉及联盟的持续和发展。事实上,美国与其盟友的关系常常是不对称的,如何增强凝聚力、加强对内控制以避免裂变的示范效应一直是联盟管理与持续理论关注的焦点。该理论认为,由于联盟中的成员国均谋求其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因此收益与成本不符、责任与义务失衡成为联盟成员间无法克服的心理障碍,对这些问题的承受程度是联盟能否持续的关键。关于危机对联盟的影响问题,该理论指出,联盟是所有组织中协调能力合作程度最强的,尤其在面临突发事件时;但不可否认突发事件也可能是导致联盟解体的一个转折点。^③

联盟理论对于我们分析更具有普遍性的不对称合作稳定性问题具有很强的理论借鉴意义,但仍有一些根本性差异值得注意:一是合作的灵活性问题。联盟因其责任义务的明确规定和制度性安排而相对稳定,一般性不对称合作的灵活性则更强,维持起来也更为困难。在如何平衡灵活性与稳定性的关系上,联盟理论的解释力明显不足。二是威胁认知的差异。联盟

^① [美]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著,宋承先、洪文达译:《1929—1939年世界经济萧条》,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

^②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杨炯译《全球政治经济学:解读国际经济秩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00—102页;周方银“实力、观念与不对称关系的稳定性——以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为例”,《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31—33页。

^③ 王帆“联盟管理理论与联盟管理困境”,《欧洲研究》,2006年第4期,第111—125页。

的基础是对外部威胁的共同认知,这也是联盟持续的最重要动力;而一般性不对称合作的基础既包括共同的利益需求,也有可能涉及共同威胁,并且,影响合作维持的威胁也更为分散,成员国内部的政治动荡也是影响合作关系的重要因素之一。

1.3 不对称理论

与霸权稳定论不同,不对称理论认为不对称关系的维持和稳定并不依赖于悬殊的实力对比,相反,不对称的权力结构可能导致系统性的错误知觉,换言之,不对称的物质结构本身就会导致合作关系的不稳定性。^①但随着关系结构产生的时间越长,关系将越来越趋于成熟,发生结构性错误知觉的可能性也将大大降低。^②另外,物质结构不是影响不对称合作的唯一因素,弱国自主性的被满足和双方在合作收益上的不对等关注也为不对称关系的维持提供了动力。^③按照不对称理论,强国希望得到弱国的顺从,这种顺从并不一定就是屈服,而只是当弱国追求自身利益时能在最低程度上不忽略强国的相对身份。强国不需要弱国对其自主性的承认,因为弱国没法威胁到它的这一利益。对弱国而言,最重要的是得到强国对其自主性的尊重。^④以此为前提,强弱双方才会进入不对称关系的实质阶段,即成本—收益的博弈。在计算收益过程中,强弱双方在合作收益上的不对等关注是不对称合作维持的关键。弱势一方主要关注与强手的不对称关系是否有助于其快速提升自身的实力和地位,因而对合作收益的评估视角相对集中,对应对眼前的挑战和获取绝对收益更为关注;而强势一方应对的更多的是来自外部的国际竞争和均势考虑,对合作收益的评估视角更广,并不会担心弱势一方可能的挑战。因此与弱势一方的博弈并非它们的战略重点。只要与弱势一方的合作有助于其整体战略考虑和全盘收益,合作就是可以接受的。^⑤

对照现实,不对称理论的确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将强弱双方视为理性人,从绝对收益和相对收

益的角度分析双方的合作态度,但同时也忽略了双方“非理性”的一面,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国内层面的政治转向。如何在国家“非理性”因素出现的时候,保持不对称关系的稳定,是不对称理论难以回答的。

上述讨论为本文分析不对称合作的稳定性问题提供了理论基础。接下来,笔者将在此基础上引入策略互动视角,指出双方的策略互动是维持政治转向背景下不对称合作稳定的关键。

二、政治风险、策略互动与不对称关系的维持

策略互动不同于结构视角,它关心的是不同行为体的策略选择所导致的集体后果。^⑥换言之,它重点分析的是行为体采取何种策略能达到其期望的结构性后果。其关注的重点不仅在于个体的行动策略,还包括互动的逻辑和结果。因此,运用策略互动视角分析不对称合作中的政治风险与关系维持,具有较强的解释力。

本文认为,面对政治风险的上升,维持不对称合作关系的首要条件是准确把握对方的需求,关键是通过策略互动,满足对方的需求。大国一方根据对方政治转向的性质判断其政治需求。政治转向对国家性破坏程度不同,当政者的目标和需求也是不同的。根据影响程度的不同,政治转向大体分为三种类型:政体改变、民主与政治危机(内战)的转化以及政府更迭或

^① Brantly Womack, *China and Vietnam: The Politics of Asymmet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② 林民旺“沃马克的结构性错误知觉理论研究”,《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65页。

^③ 孙杰“不对称合作:理解国际关系的一个视角”,《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9期,第122-146页。

^④ 同②,第62页。

^⑤ 同③,第135-136页。

^⑥ 周方银“国际结构与策略互动”,《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10期,第6-17页; David A. Lake and Robert Powell, eds., *Strategic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

“行政政变”。^①当国家性受到严重威胁或国家无法实现政治与军事统一时,当政者首要关注的是国家存亡和尊严维护;一旦国家性危机得以缓解或暂时消除,巩固政治合法性便替代维护国家性,成为首要目标和政治需求。^②面对政治风险的上升可能给不对称关系带来的不确定性,实力不对称的双方关注点也是不同的。转型国家一方倾向于优先关注其国内政局和局部利益,而大国一方则更关注全局和长远利益。因此,为确保自身的权力,大国大多数时候会根据全局的影响程度对是否维持不对称合作进行权衡。对对方需求的了解和把握是采取行动、进行策略互动的前提。在此基础上,合作双方为维持不对称合作所采取的策略互动决定了合作关系的走向。当前国际关系中最常见的策略互动主要有:危机援助、相互战略保证、第三方非正式协调等。

危机援助。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国际援助,危机援助特指在国内国际危机之下所采取的援助行动,既包括物质上的经济和发展援助,也包括声誉上的外交援助和国际声援。对于不对称关系中的小国一方而言,大国的危机援助尤为重要。国际关系学者在研究美国的联盟援助时发现,当涉及盟国的危机威胁美国的权力时,美国更可能援助盟国。^③尽管导致大国一方进行危机援助的动力因素有很多,包括共同的民主理念和价值取向等,但其根本上还是一种“理性选择”现象,并且,危机援助和介入危机的方式、时机、秩序也始终围绕着成本与收益的杠杆加以运行。危机援助是在为双方不对称合作的权利义务关系寻求新的平衡点创造条件。随着危机援助中双方义务的兑现,维持不对称合作关系的风险也在这一过程中得以减少或化解。

相互战略保证。简单来说,是指让他国减少对一国意图(引申为对一国的实力)担忧的话语或行为。维持和深化合作需要一系列而不是单个的相互战略保证共同努力。^④战略保证反映出的是对共同利益和相互信任的重视,其中暗含两层意思:一是合作和信任,二是冲突和不信任。在不对称关系的维持过程中,合作和冲突是并存的,战略保证就是要实现合作与信任的

相对强化和冲突与不信任的相对弱化。那么,在政治风险上升的背景下,什么样的相互战略保证才是成功的呢?首先,成功的相互战略保证必须要引起接收者的积极回应;其次,建立信任措施、提高战略透明度、相互适应、加强沟通等举措是相互战略保证成功的关键;最后,在原有的战略基础上进行战略再保证,对于危机中的不对称合作关系尤为重要,其方式具体体现为政治“宣示”、合作充实和拓展、权利义务关系更新等。

第三方非正式协调。在不对称关系中,除合作双方之外,常常还存在影响关系维持的第三方力量。由于第三方干预势力的介入,使得不对称合作的维持不再仅仅是合作双方之间的策略互动,而是需要在必要时候,与第三方力量一道通过开展非正式协调与对话的方式,实现合作共赢,避免战略对抗。事实上,中国已经在南亚地区进行尝试。外交部长王毅曾在2014年访问尼泊尔时,提出中方愿适时探讨中尼印三方合作的可能性。^⑤国内也有学者积极倡议中尼建设“喜马拉雅通道”,应将印度纳入三方磋商中来。

接下来笔者将以新世纪以来的中斯不对称合作为例,验证上述观点的适用性。

三、以新世纪以来的中斯 不对称合作为例

斯里兰卡国内政治进程具有独特性,主要

^① 包刚升著《民主崩溃的政治学》,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6-18页。

^② 包刚升“国家重建、组织化暴力与政治转型”,陈明明主编《复旦政治学评论:比较视野中的现代国家建设》(第13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③ 王石山、韩召颖“美国为何援助国际危机中的盟国(1946-2006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8期,第107-134页。

^④ 唐世平“相互战略保证:一个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合作构建理论”,《复旦国际关系评论》2011年第1期,第121-162页。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王毅:希望中国、尼泊尔、印度三方关系相互促进、良性循环、积极互动”,2014年12月27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12/xgxw_676818/t1223276.shtml。

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民主转型在总统和议会权力的相互较量中缓慢推进。其二,种族冲突严重制约斯里兰卡民主政治发展。其三,印度对斯里兰卡的政局影响由来已久。这三大特点既是塑造斯里兰卡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也是引发政治风险的重要因素。新世纪以来,以2001年5月中国总理朱镕基访问斯里兰卡为契机,中国积极发展与斯里兰卡的关系,两国关系进入不对称合作的新阶段。但此后斯国内两次政治转向给中斯关系带来了明显的影响,导致关系维持面临考验。之所以合作关系在强化、倒退、恢复中得以维持,主要得益于中斯两国积极有效的策略互动。

3.1 斯民主倒退与中国的危机援助

2005年11月,马欣达·拉贾帕克萨(Mahinda Rajapaksa)掌握斯里兰卡的最高权力后,一反上届政府“优先谈判”的策略,坚持用武力将猛虎组织彻底打垮,武力结束内战成为其执政的首要目标。由此引发的政治转向和国际环境恶化迫使斯里兰卡积极向中国接近。为确保斯里兰卡政局稳定 and 经济发展,中国将危机援助作为主要手段,发挥了维持中斯不对称合作稳定器的作用。

拉贾帕克萨上台后一系列的行动导致了斯里兰卡国内的民主倒退:一是强化了总统的权力,弱化了议会的权力,同时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巩固了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完全掌控了国家机器的主导权,导致斯里兰卡民主崩溃的风险增大;二是任命强硬派官员负责大规模清剿“泰米尔伊拉姆解放虎”组织(以下简称“猛虎组织”)的军事行动,严控社会舆论,查禁所有同情猛虎组织的言论,在政府军控制区搜捕民间的猛虎组织同情者,并大幅提高外国非政府组织的入境门槛,严重破坏了民主体制的社会根基。^①

外交是内政的延续。拉贾帕克萨主导的政治转向引发了国际环境的急剧恶化。一方面,与西方国家反目。西方国家批评拉贾帕克萨的“强人政治”将斯里兰卡民主引入歧途,并质疑内战时期政府军与猛虎组织严重践踏人权的行。联合国还出台了一份报告指出,斯里兰卡

政府军和猛虎组织存在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的行为,建议就此战争罪行展开独立的国际调查。在西方国家贸易制裁、舆论施压和国际调查下,斯里兰卡与西方国家的关系日趋恶化。另一方面,与印度疏远。拉贾帕克萨上台后便将此前军事打击猛虎组织失败的原因归结于印度的干预和对印政策的失误,导致斯印关系出现裂痕。^②

在斯里兰卡国内政治剧变和国际环境恶化的双重压力下,中斯关系维持了基本稳定,并在原有基础上快速发展。这与中国积极主动的对斯危机援助有很大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两方面:第一,加大投资。中国凭借“不附带条件的海外援助政策”取代日本成为斯最主要的援助国。短短三年间,中国对斯投资就从2005年的几百万美元增至2008年的接近10亿美元。中国重点在基础设施领域加大对斯发展援助,包括援建汉班托特港^③、普特拉姆燃煤电站、米里格默专属经济区、科伦坡-卡图纳亚克(班达拉奈克国际机场)高速公路等大型项目。^④根据斯方财政部的统计,中国承诺的对斯“双边援助”和“出口信贷”从2007年的近4亿美元增至2009年的12亿美元。^⑤中国商务部的数据也显示,中国对斯直接投资在2008年出现了大幅增长。^⑥第二,外交声援。在斯里兰卡的国际环境

^① Rajesh Venugopal,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Executive Presidency in Sri Lank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6, No.4, 2015, pp.684-686.

^② Ashok K. Behuria & Gulbin Sultana, “Mahinda Rajapaksa’s India Policy: Engage and Countervail”, *Strategic Analysis*, Vol.37, No.1, 2013, pp.89-90.

^③ 拉贾帕克萨上台前,斯政府就曾请求中国援建汉班托特港,中国表示同意,但没有实质性进展。2007年3月,拉贾帕克萨与中国主席胡锦涛签署联合声明表示,将于当年年底启动该项目的建设。

^④ Nilanthi Samaranyake, “Are Sri Lanka’s Relations with China Deepening? An Analysis of Economic, Military, and Diplomatic Data”, *Asian Security*, Vol.7, No.2, 2011, pp.119-146.

^⑤ Sri Lanka Ministry of Finance and Planning & the Treasu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xternal Resources, “Annual Report and Foreign Aid Review”, March 15, 2016, <http://www.treasury.gov.lk> and <http://www.erd.gov.lk>.

^⑥ MOFCOM, “2008 Statistics Bulletin of China’s 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eptember 25, 2009, pp.53, 58. <http://hzs2.mofcom.gov.cn/accessory/200909/1253869308655.pdf>.

日趋恶化的背景下,中斯两国的外交关系更加紧密。这与两国长期以来共同的政治价值取向——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不无关系。该原则是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的,中斯两国都参加了会议,并对该原则表示认同和支持。中国多次强调,双边关系应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之上,尤其是不干涉内政、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在2007年中斯《联合公报》中,中方支持斯里兰卡打击恐怖主义及维护主权、民族团结和领土完整所做的努力,中方欢迎斯里兰卡政府为通过和平谈判解决民族问题所采取的积极措施。斯方也重申,将不会改变并坚定支持中国的“一个中国”政策。^①在国际多边舞台上,中国坚决捍卫不干涉内政原则并给予斯里兰卡外交声援:2009年5月,中国联合印度、俄罗斯等国抵制西方国家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通过对斯人权决议,并将斯内战定性为“不受外部干涉的内政问题”。^②另外,基于共同反对“三股势力”的战略利益,2009年6月,斯里兰卡还被批准成为上海合作组织“对话伙伴国”。

3.2 拉贾帕克萨政权的合法性危机与中斯战略保证

2009年5月,斯里兰卡持续二十多年的内战结束,2010年拉贾帕克萨取得总统连任。随着国家性危机得以缓解或暂时消除,拉贾帕克萨政权的合法性危机逐渐浮出水面,成为新的政治转向的导火索。

拉贾帕克萨治下的“软威权主义”在其第二任期并未有所扭转。^③相反,拉贾帕克萨的总统权力进一步强化。2010年9月,他成功修宪,取消总统任期限制,为其成为终身总统做准备;与此同时,社会奖惩和利益分配机制也逐渐被总统及其家族所控制,宪法和法治的约束能力下降。^④由此导致的政权合法性危机广泛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多个方面:在政治方面,民族平等和权力下放的宪法改革未有进展,选民分裂严重和政党民族化的趋势更加显著。^⑤在经济上,由于反对市场改革,以及过于重视发展基础设施而忽视减贫和权力下放,导致

大部分国内经济改革进程陷入停滞状态。^⑥在社会层面,拉贾帕克萨的家族垄断、以权谋私和贪污腐败使之面临道德滑坡的危险,社会分配不均和国家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未能使发展成果惠及普通民众,其利用经济手段取代政治改革拉拢少数民族群和处理民族冲突的方式也日渐不得人心。

拉贾帕克萨政权的合法性危机直接导致其在2015年初的总统选举中落败。新总统西里塞纳(Maithripala Sirisena)上任后,为彰显和确立新政权的合法性和政治威信,树立清廉和改革的形象,在内政和外交上均与拉贾帕克萨政权作出了决裂。一方面,为与拉贾帕克萨治下的“软威权主义”划清界限,西里塞纳启动了国内民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在对外政策方面,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同时加强与印度等国的“均等关系”。西里塞纳政府对中国在斯援助和投资的一些大型项目进行重新评估,“暂时并立即”叫停由中国企业投资建设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的施工。显然,围绕政治合法性所发生的新的政治转向直接导致了中斯不对称合作关系的倒退。然而,中斯不对称合作的利益基础并未受到根本性破坏。自2015年下半年起,两国关系逐渐转暖,中斯不对称合作得以恢复和继续推进,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两国危机之下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新闻公报”,2007年10月15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84/1207_676896/t372336.shtml。

^② Catherine Philp, “Sri Lanka Forces West to Retreat over ‘War Crimes’ with Victory at UN”, Times of London, May 28, 2009.

^③ Neil DeVotta, “From Civil War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Sri Lank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22, No.3, 2010, p.331. 作者注“软威权主义”不同于专制主义,是指在这样一个体制里,公民获得足够的自由,但不能挑战国家制度或是统治者的权威。

^④ Neil DeVotta, “From Civil War to Soft Authoritarianism: Sri Lanka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Global Change, Peace & Security*, Vol.22, No.3, 2010, p.333.

^⑤ 参见杨恕、李捷“斯里兰卡的民族冲突与多党制下的政党民族化”,《太平洋学报》2008年第4期,第18-25页。

^⑥ Rajesh Venugopal, “Democracy, Development and the Executive Presidency in Sri Lanka”,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36, No.4, 2015, pp.684-686.

的相互战略保证。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层面,保持高层互访,重申合作基础。2015年3月,在中斯关系陷入危机之时,斯新总统西里塞纳访华并出席博鳌亚洲论坛年会,在与中国主席习近平会谈期间重申了两国政治和战略合作的基础,强调了在国际社会中给予斯坚定外交支持的重要性,并表示“将采取比过去更有力的措施”,发展与中国的合作;他还特别提到,“目前科伦坡港口城出现的情况是暂时的,短期的,问题不在中方。”“将努力确保把中国提供的支持用于斯里兰卡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提高。”^①10月,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玛辛哈(Vic Rama Singh)在科伦坡会见到访的中国政府特使、外交部副部长刘振民,斯方积极表态,将在推进重大项目合作和发展战略的同时“继续视中国为可依赖的重要合作伙伴”。^②2016年1月,维克拉玛辛哈在达沃斯经济论坛上公开表示,斯政府已决定继续推进多个中国贷款或投资建设的基础设施项目,包括此前被叫停的科伦坡港口城项目及汉班托特港下一期项目。2月,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结束访问非洲回国途中经停科伦坡,在机场应约会见斯外长萨马拉维拉(Mangala Samaraweera),两国政府密切沟通,为合作重启打通通道。4月,斯总理维克拉玛辛哈访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分别与之举行会谈,足见中国政府的重视。习近平主席强调,双方应“从长远和战略高度把握中斯关系发展方向,做好两国关系及各领域合作的顶层设计”,两国在“一带一路”建设对接上有广阔合作前景。斯方宣布批准科伦坡港口城项目恢复施工。^③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易先良表示,“中斯关系已走出困难期”。7月,王毅外长又受邀访问斯里兰卡,在与斯外长的会谈中,双方重申“使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

第二,在项目推进方面,照顾和回应各方的主要关切,并维持各方均能接受的战略平衡。以前搁置的科伦坡港口城为例,一方面,将日本、印度、新加坡等投资方拉进来,与中国一同

投资港口城的项目建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斯政府发展与中国的国内国际压力,也照顾了地区国家的战略关切。另一方面,中斯两国协定将签署科伦坡港口城的修改协议,其牵扯的补偿问题将“在友好的气氛下解决”。^④除此之外,近期两国还在灾害救援、航运、船只补给、自贸区谈判等多个领域开拓了新的合作方向。可见,两国政治上的战略保证落实到了具体项目推进上,实现了双方不对称合作关系的转圜,也为两国进一步确认双方合作意愿和各方利益关切,增强危机应对能力,以及确保不对称合作关系的稳定提供了宝贵经验。

第三,在外交领域,中斯在彼此核心关切的战略性问题上给予对方支持和声援,实现了对对方的战略再保证,降低了战略误判的几率。2016年6月和7月,斯里兰卡国防部常务秘书、外长均公开表达对中国南海政策和立场的支持;认为美国应该停止插手南海事务;中国是非常热爱和平的国家,绝不会做出损害南海、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决策和举动;解决南海问题正确的做法是,通过双边谈判解决所有争端,以达成一项双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方案。^⑤对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倡议,斯政府大力支持,并表示“斯里兰卡愿发挥印度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习近平同斯里兰卡总统西里塞纳举行会谈”,2015年3月26日,http://www.fmprc.gov.cn/web/ziliao_674904/zt_674979/dnzt_674981qtztydyl_675049/zyxw_675051/t1248862.s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斯里兰卡总理维克拉玛辛哈会见中国政府特使刘振民”,2015年10月9日,http://www.fmprc.gov.cn/web/wjb_673085/zjzg_673183/yzs_673193/xwlb_673195/t1304610.shtml。

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斯里兰卡民主社会主义共和国联合声明”,2016年4月9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84/1207_676896/t1354364.shtml。

④ 郑青亭“科伦坡港口城全面复工,停工损失赔偿正在协商”21世纪经济报道,2016年4月9日,http://m.21jingji.com/article/20160409/e35bb42ef6ada9c748549c00d575c15c.html?from=singlemessage&isappinstalled=0。

⑤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斯里兰卡理解并支持中方在南海问题上的立场”,2016年7月9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84/xgxw_676890/t1378891.shtml。

洋枢纽位置的优势,同中方共建海上丝绸之路”。^①

3.3 印度因素与“中斯+印度”非正式协调

自中国加强与斯里兰卡关系以来,印度就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存有疑虑。因此,面对拉贾帕克萨政府与中国政府走近、而与印度相对疏远,印度的反制措施之一是通过影响斯里兰卡国内政局的走向,削弱中斯合作的基础。尽管拉贾帕克萨的威权政治是其“意外”下台的决定性因素,但印度对斯政局的影响不可忽视。认识到这一点,2015年2月,外交部长王毅在同来访的斯里兰卡外长萨玛拉维拉共同会见中外记者时表示,中方对中、斯、印三方合作持开放态度,愿积极探讨三方可能合作的领域和可行领域。^②尽管开展“中斯+印度”非正式协调的有效性还有待检验,但中国的倡议明确传达出与印度加强战略沟通的意图,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印度的对华疑虑,还有可能为中印共同推进斯里兰卡政治和经济发展提供互利共赢的合作平台。

四、结 语

国际关系中大部分的合作是不对称合作。与对称性合作相比,实力对比悬殊所造成的物质结构不均衡直接影响了合作关系的稳定性。然而,随着国际关系中国内—国际层次互动的加深,跨国安全威胁的增多,不对称合作所面临的环境日趋复杂,影响合作关系的威胁来源不再局限于结构性因素,进程性和情境性威胁凸显,导致不对称合作的维持变得更加困难了。其中一个备受关注的现象或趋势是:大国积极发展与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转型国家之间的不对称合作,但由于这些国家的政治转向未减反增,导致大国与之发展不对称合作时不得不面临更大的政治风险。比如,美国的盟友体系正面临来自内部的威胁,为确保美国的利益和权力,美国不得不疲于应对联盟的内部冲击。中国作为崛起大国,积极拓展和深化与世界各国

的合作,与小国的不对称合作日益受到重视,成为外交布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推进实际上就是要兼顾与大国的对称性关系和与小国的不对称关系,尤为强调加强与周边小国的合作。在此背景下,如何做好风险评估,通过合理的策略互动维持不对称合作的稳定发展极为重要。斯里兰卡国内的政治转向为中斯关系发展带来了不确定性,也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出了挑战,但同时也为中国探索和发展与周边小国策略互动的新思路提供了契机。对不对称合作中的政治风险和关系维持等相关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不仅对于我国开展与周边中小国家的不对称合作、实现“一带一路”建设对接、合理因应海外政治风险,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际关系学界对于不对称合作的理论探讨。

编辑 龚 婷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斯里兰卡总理希望斯中共建海上丝路”2016年7月9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84/xgxw_676890/t1378903.shtml。

^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王毅:愿积极探讨中、斯、印三方合作”2015年2月27日,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yz_676205/1206_676884/xgxw_676890/t1241345.shtml。

Political Risks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symmetric Cooperation: Sino-Sri Lanka Relations in the New Century

WU Lin¹

(1.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Abstract: Asymmetric cooperation is the normalcy in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teractions between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ectors, it becomes more difficult to maintain the relations of asymmetric cooperation. A highlighted phenomenon or tendency demonstrates that political turns of transitional countries become more frequent, which lead to unexpected political risks for great powers when promoting asymmetric cooperation. To understand the threat and maintain the asymmetric cooperation are the common challenge faced by decision-makers and academics. To answer this question, the paper, based on analysis of existing theories, attempts to introduce the perspective of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nd argues that strategic interactions are the keys to risk mitigation and cooperation maintenance, which comprises assistance in crisis, mutual strategic assurance and informal coordination of third party. The paper also verifies the applicability of strategic interaction with the case of Sino-Sri Lanka relationship in the new century. The conclusion has important implications for China in the further construction of “Belt and Road”, providing new perspective to promote interaction with small countries in the neighborhood.

Key words: asymmetric cooperation, political risks, strategic interactions, Sino-Sri Lanka relationship